

我与聊城晚报的故事

李连文：公益路上与晚报同行

本报记者 张承斌

他是一名普通农民，身患残疾却常年热衷公益，十几年来累计捐款近9000元；他从小一心向党，立志长大做对社会有用的人，这也是他常年坚持慈善捐款的初衷；他和《聊城晚报》结缘已久，从2008年起至今，先后有多起捐款事迹被《聊城晚报》报道，这些报道他一直珍藏着……他就是莘县河店镇务庄村村民李连文。

初次见到李连文，记者注意到，他身材瘦小，穿着朴素，肤色较黑。他的右手蜷缩着，无法正常展开——7岁的时候，他因一场意外事故导致肢体残疾。李连文以务农为生。很难想象，在这样的情况下，他已在公益道路上坚持了十几年：从2008年开始，他通过中华慈善总会、中国红十字会、山东省慈善总会、聊城市慈善总会等机构，共计捐出善款近9000元，光是捐赠证书就有将近50本。今年以来，他已经向中华慈善总会、聊城市慈善总会捐款10次，共计1000元。

为什么坚持慈善捐款？李连文说，上学的时候，同学们经常对他进行帮助，这让他的内心感受到了温暖。小时候，村里经常播放《林海雪原》《闪闪的红星》等经典红色电影，共产党人一心为民、无私奉献的精神让他感触颇深并铭记在心。再到后来，全国上下掀

起学习雷锋的热潮，更是让他备受鼓舞。这些成长经历，让他一步步坚定了自己的信念：要向这些榜样和模范学习，多去帮助别人，多为社会作贡献。就这样，他十几年如一日地奔走在公益路上，只要从电视上看到或从收音机上听到哪里发生了灾情，他便通过各种爱心机构捐款，50元、100元、200元……虽然金额不多，但能够为灾区群众尽一份力，也算了了他的一桩心愿。

《老李又来捐款了》《近50本捐赠证书见证——莘县残疾农民李连文的13年公益路》……本报记者曾对李连文进行多次采访，并先后刊发多篇新闻报道，让更多读者了解李连文先进事迹的同时，在全社会弘扬正能量，营造了全社会关心、支持和参与慈善事业的良好氛围。

“晚报每一篇关于我的报道，我都会珍藏起来，没事儿的时候就拿出来读一读，每次读完我都对自己所做的事更有信心，也更有动力了。《聊城晚报》就像一盏明灯，她见证了我的公益初心，也照亮了我前行的道路。有了她的陪伴，我会继续在这条公益路上走下去，为社会作出更多力所能及的贡献。”采访最后，李连文坚定地说。

►李连文积极投身公益事业的相关报道



你所不知道的聊城

季羨林和李长之

□ 赵瑞峰

1978年，北京大学东方语言文学系主任、教授季羨林随代表团赴印度访问期间，作家、文艺批评家李长之因病去世。季羨林回国后得到消息，“既吃惊又痛苦”。从1918年开始，季羨林、李长之相交六十年，李长之无疑是季羨林相识最早的朋友。

说来也是缘分，老家在今东营的李长之，两岁时随父亲移居济南。1917年，季羨林离开家乡聊城去济南投奔叔父。次年，年仅七岁的季羨林和年长他一岁的李长之，同时进入省立第一师范附属小学（以下简称“一师附小”），成为同班同学。他们就此认识，并成为要好的朋友，虽然还谈不上有什么亲密往来。也正是在这里，初步奠定了两人以后长达数十年的友谊。

季羨林在一师附小读书的时间不到两年，1920年因叔父不满意学校的新派教育，季羨林转学到新育小学。季羨林和李长之就此分别。

从转到新育小学，到从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毕业，考入清华大学之前，季羨林的求学道路并不太顺利。从季羨林的自述中能够知道，1924年他从新育小学毕业后，因缺乏报名勇气，和当时颇为著名的济南一中无缘，报考了不被人看好的正谊中学，初中毕业后，在本校继续读了半年高中。等到山东大学附属高中成立，便转学到这里念书，后来又转入新成立的山东省立济南高中。

季羨林在《追忆李长之》一文中写道：“山大附属高中成立后，我转到那里去念书。念了两年，日寇占领了济南，停学一年。1929年，山东省立济南高中成立，我转到那里，1930年毕业，考入清华大学。于是，在分别十年之后，我同长之又在清华园会面了。”

相较季羨林，李长之的求学之路无疑要顺利一些，他在一师附小毕业后，即考入济南一中，由济南一中到齐鲁大学附中，再到北大预科，最终进入清华大

学。在分别十年之后，季羨林和李长之终于在清华园会面。

在清华大学，李长之先入生物系，后因不能适应，遂转入哲学系，季羨林则考入西洋文学系。在这里，他们往来较密切，后来又和中文系的吴组缃、林庚成为朋友，因四人都喜欢文学，都喜欢舞文弄墨，人送称号“清华四剑客”。

郑振铎那时是文坛明星，著有知名的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，是季羨林、李长之崇拜的对象。郑振铎在清华大学教授中国文学史，季羨林和李长之便去旁听，又购买他的《插图本中国文学史》一书，不久就和郑振铎结成“忘年交”。季羨林、李长之还曾到郑振铎在燕京大学的住宅拜访过他，观其让人惊叹的藏书。当时郑振铎同靳以等人主编《文学季刊》，季羨林和李长之或做编委，或做特邀撰稿人，颇为得意。

暑假期间，季羨林和李长之曾一起回到济南，李长之宴请当时在齐鲁大学教书的老舍，邀季羨林作陪。这是季羨林认识老舍之始，后来亦成好友。

时间很快到了1935年，季羨林从清华大学毕业后，应母校山东省立济南高中邀请，到那里教了一年国文。同年，季羨林考取清华大学与德国的交换研究生，因此又回到北平办理出国手续，住在清华大学招待所。这时李长之因转系原因尚未毕业，在这短暂的相处中，他们还同到南院去拜访闻一多先生。这是季羨林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见到闻一多先生。

李长之重视和季羨林多年的友谊，知好友行将出国留学，除了在他主编的天津《益世报》文艺副刊上写长文为其送行，又邀集朋友，在北海为季羨林饯行。时值夏日，荷风送爽，景色虽然迷人，但季羨林不免思绪万千。

季羨林到德国的前两年，与李长之不断有书信往

来，李长之还给他寄去日本学者高楠顺次郎的《印度哲学宗教史》，并在扉页写了一封信。二战开始后，邮路断绝，两人不通音信长达八九年。然而季羨林还是从清华大学校友许振德给他的信里，得知李长之笔耕不辍，著述惊人。

到1946年夏天，季羨林离开祖国十一年后，历经艰辛回到祖国。季羨林先去上海，见到好友臧克家，再到南京，见到分别十一年之久的李长之。李长之那时在国立编译馆工作，薪金微薄。季羨林虽然已接受北京大学聘请，但尚未上班，没有工资，李长之也是爱莫能助。季羨林初到上海时曾卖掉从瑞士带回来的欧米茄金表，得到八两黄金，换成法币，一半寄回济南家中，一半自己留用。但手上法币不多，只够吃饭，没有钱住旅馆，就睡在李长之的办公桌上。

在南京居停期间，季羨林无事可干，因得饱览南京风光，其中台城是去得最多的地方。李长之趁周末也陪季羨林外出走走，两人无话不说。李长之告诉他国内的情况，还曾冒着被盯梢的危险带他去看《新华日报》。另外，与李长之同在编译馆工作的梁实秋，也是通过李长之的介绍，认识季羨林的，并成为忘年交。不久，季羨林离开南京，曲折到达阔别十一年的北平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李长之由南京调到北师大，数度分别数度重逢，季羨林和李长之再度在北京会面。

1978年李长之去世后，季羨林未及时写纪念文章，个中原因难以索解。这对他来说像是背负了一笔债，直到2001年这笔债才终于还上。在《追忆李长之》这篇长文的末尾，季羨林以悲痛交加的心情写道：“……我们相交六十年，生不能视其疾，死不能临其丧，我的心能得到安宁吗？呜呼！长才未展，命运多舛；未臻耄耋，遽归道山。”

这是知己之言，也是沉痛之语。

（转载自2023年5月4日《齐鲁晚报》）